
浙江精神的结构及其价值观涵量

赵定东

(杭州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指出，从事件与关系的内在一致性上分析，各文明古国未生成普遍应用的公理系统，如中国的史学、印度的政治思想、西方以外的音乐艺术、建筑、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权力机制，都不如西方那么严密、合理。西方独具宗教观、经济生活、技术、科学研究、军事训练、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化特征，尤其是能够采取理性化行动类型的社会精神气质。而在中国，儒家维护现存社会，主张中庸之道，重视血缘关系、剥夺统一人格的追求，从而限制了理性的成长、职业的分途、劳动的合理组织与计算，外加道教的遁世观念的影响，以及有效率的货币制度的缺乏，加上官僚制的低效率行政体系、血缘体系的超法律运作及城市行会的非独立性导致了东西方精神文化的差异。

马克斯·韦伯的这种类型分析，其特点：一是以复合体看待伦理与社会的互动，克服了要素分析以局部证整体的局限；二是透过经济现象，在其背后寻找出支持某一经济行为类型的精神气质，克服了要素分析难以抓住问题实质的弱点；三是理论判断与经验事实有着完全的一致性，可以解释资本主义在西方发生的必然，和在中国发生的不可能性，克服了要素分析不能说明中西同具某一条件为何西方发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中国却未曾发育而出的缺陷。

姑且不论马克斯·韦伯观点的局限性，但这种分析路径对于认识和理解浙江精神及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浙江精神的四重结构

精神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的心理状态，也指表现出来的活力。因此它是一个中性词，但在实际运用中，它是中性褒用。

具体到浙江精神，主要是指在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浙江特质。2000年浙江省委扩大会议将“浙江精神”定义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16字，这个提炼很有意义，但从复合体看，也有一些平面化缺陷。我个人认为总结浙江精神不能排除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坐标体系。从这点出发，我将浙江精神概括为四重结构：适时的人文精神、进取的商业精神、务实的科学精神、诚信的职业精神。

所谓适时的人文精神是就浙江的历史文化背景而言的，它体现为“经世致用”和“工商为本”两个方面。我们知道，从经济发展的外在要素说，浙江有“四缺”，即缺天赋的自然资源、缺良好的工业基础、缺外资的推动力、缺特殊的优惠政策，但浙江的经济发展成就突破了这四点的制约，一个重要原因是浙江本土文化包涵着经济发展所必须的经世致用和工商为本的人文精神。关于这一点如陈锐教授、方同义教授等专家学者对浙东学术文化中的“重利”和“重商”思想展开了诸多分析。我想补充的是，这种文化是浙江自发自生的，是地域本土化的一种推动力。是在潜意识里就有的“天人相分”因子对传统中国“安息于土地”社会价值观的扬弃。

所谓进取的商业精神是就浙江民营企业即浙商良好的冒险与创业精神以及企业创新精神产生的创业效应现实而言的。主要体现在自主创新和图强勤勉两个部分。就目前研究现状看，有学者如张宗和指出了当代浙商精神体系的三大主观要件：求富意

识、创新意识和学习意识。从浙商精神的内涵和要素来看，有学者如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林吕建研究员等提出概括与提炼应是从两个阶段进行：创业期和守业开拓期。认为创业期的浙商精神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炽烈企业家精神”，他们不怕苦、敢冒险、敢为天下先、求实而乐于探索。而守业开拓期的浙商，主要是通过艰苦奋斗和改革创新，稳定持续地保有自己的商业成果，并使之进一步巩固与扩大。

所谓务实的科学精神是就浙江本土地域中所包含的理性与感性有机结合的求真特质而言的。它体现为浙江贪大而不拒小、求富而不嫌贫、求变而不弃稳三个方面。初看浙江的商业表现，其成就很大部分是在传统以外的“非边际”制度创新方面先走了一步的结果，诸如一发而不可收的私人经济、“浙江特色”的股份合作制、“遍地开花”的各种专业市场等等，但从社会角度看，这恰恰又是主张唯真理是从、崇尚脚踏实地、注重实效的科学精神体现。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务实求真的科学精神得到了发挥的土壤。浙江企业的初创大多靠吃苦耐劳，但也看到，企业对科学技术的投入使得浙江企业家有“知识英雄”称谓，经营层次越来越高。在这个意义上说，有时精神资源比物质资源具有更为关键性的意义。

诚信的职业精神是学界在总结浙江精神时容易忽视的一个方面。它是指浙江人讲实际、肯学习、善经营、重实干、求成效的职业操守中的重要方面。如商业行为发展出的信用观念和体系的确立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社会文化资本同时，又成为浙江社会能够持续稳定发展的动力源。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观念体系还在不断地创新和发展。

浙江精神的价值观取向

价值观是指对经济、政治、道德、金钱等所持有的总的看法。一般而言，由于人的社会地位不同，价值观有所差异。价值观念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属于上层建筑，它的存在和发展必然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基础。在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变为另一种社会经济结构时，价值观念变化着、发展着，并反映着现存的社会经济关系。

从浙江精神的概括中可以看出，其价值观取向主要体现为通世变、重实利、善运作三个方面。

所谓通世变是指浙江在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能否不拘一格，根据其所处的不同环境适时地确立自己的行动策略。如陈立旭教授所指出，当代浙江现象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民间诱致”和“政府增进”的制度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二者是一个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相结合的过程。自发与内生的动力来源于民间力量。民间的力量对于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自发组织的作用。民间自主谋生与自主创新就是通世变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所谓重实利是指自立自主意识和注意维护活力及权益的价值取向。它强调理想、信念、精神要与现实生活相协调、相适应。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们讲求实效，不断吸收外来经验，并与浙江实际相结合，闯出富有浙江特色的发展道路。他们“不搞争论”、“拿事实说话”，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埋头苦干，努力求利，走上了一条“以市场为目标、以市场求生存”的发展路径，如在不同时期不断调整和优化的产业结构。

所谓善运作是指浙江人在市场经济中行为方式的价值取向，也就是浙江人在经商行动中很善于找路子，拉关系，拜码头，跑靠山。当然在这里，运作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我们知道，浙江奇迹主要是靠民间的力量自下而上推动的，浙江模式是内生型的发展模式，隐藏在它后面的是浙江人的奋发进取精神、敢为人先的气度和吃苦耐劳的品质。但在外无项目引导、内无政策支持的背景下，如何“闯”就成为一个先决条件。运作就是民间群众自主的自创性行为的产物，也成为了富有特色的一个价值观。

但要指出的，任何价值观都有其时代性，也就有其局限性。特别是目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转型时期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因素使价值观面临一些新的问题。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处在变化中。浙江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诸如自立意识、效益观念、竞争意识、开拓进取精神、务实精神等价值观，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具有历

史的进步意义，无疑是当今社会所必需的。但是诸如过分追逐个人利益、无序竞争、权钱交易等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象也应该被纠正，只有这样才能使浙江精神与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从而达到浙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有序推进。